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儒林外史及其時代

張國風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儒林外史及其時代

張 國 風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儒林外史及其時代 / 張國風著. -- 初版. -- 臺
北市：文津，民82

面：公分. --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33)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083-2(平裝)

1. 儒林外史 - 批評, 解釋等

857. 44

82000218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儒林外史及其時代

(1988年北京大學博士論文)

著	作	者	：	張	國	風
指	導	教	授	：	吳	組
發	行	者	：	范	惠	美
出	版	者	：	文	津	出
					版	社

地 址：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02)3635008

傳 真：(0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811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一 月 初 版

印 數：500本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台幣 180元

ISBN 957-668-083-2

作者簡介

張國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於江蘇無錫市。一九六三年考入東北工學院，專業是金屬物理，一九六八年畢業。進撫順鋁廠當電解工。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學，攻讀古典文學，一九八一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後任教於中山大學中文系。一九八五年九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為博士生。導師為吳組緬先生，副導師固強先生。一九八八年七月畢業，獲博士學位。現任職於北京圖書館。

目 錄

一、小引·····	1
二、《儒林外史》的主要思想淵源·····	5
(一)時代思潮的演變·····	5
(二)吳敬梓接受時代思潮影響的原因·····	8
(三)從《儒林外史》看時代思潮的影響·····	37
注釋·····	81
三、《儒林外史》的政治傾向·····	111
(一)對盛世的否定·····	112
(二)康雍乾三朝知識分子政策的演變·····	127
(三)吳敬梓對康雍乾三朝的態度·····	138
(四)《儒林外史》和雍正之治·····	150
注釋·····	176
主要參考書目·····	206

一、小引

一九三五年，魯迅曾經在《葉紫作（豐收）序》一文裡，針對一些看不起《外史》的人，不無諷刺地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麼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卻與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為它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曾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魯迅諷刺了那些看不起《外史》的人們，蔑視了他們的「蔑視」。五十多年過去了，知道並喜歡《儒林外史》的人越來越多了，而《外史》的研究、吳敬梓的生平研究，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外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與《外史》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相比，依然是不成比例的。《外史》研究的規模非但遠不及與它同時誕生的《紅樓夢》，而且也比不上其他幾部古典小說名著，如《聊齋志異》、《水滸傳》。可以說，《外史》的偉大，仍然是一個值得

探討的問題。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識分子爲主角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涉及廣泛的社會階層，但描寫的重心是知識分子。其他階層的描寫，從屬於這一重心的描寫，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揭示圍繞著知識分子的社會環境的性質和特點。

在《儒林外史》誕生以前，知識分子的生活和命運一直是小說家（以及戲曲家）感興趣的題材；但是，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歷史命運，只是到了吳敬梓的筆下，才得到了那樣全面、充分而深刻的反映。吳敬梓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諷刺才能，成功地表現了我國封建社會晚期知識分子命運這一具有豐富現實內容和巨大歷史深度的題材。

《儒林外史》的深刻之處在於，它不但向讀者表明了，封建社會晚期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和歷史命運是什麼樣的，而且用藝術的形象向讀者表明，這一切爲什麼是這樣的。作者通過環境和世態的描繪做到了這一點。這種環境、世態的描寫十分深刻、十分出色，在小說裡很顯眼，以至於使有的研究者誤以爲世態的描寫是作者的主要目標。其實，現實環境和世態的描寫無不從屬於知識分子這一主體的描寫。

吳敬梓對環境和世態的描寫之所以如此深刻，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原因，本文的重點是分析客觀方面的原因。

所謂環境和世態描寫的深刻性，首先意味著這種描寫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即是說，小說中所描寫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道路以及知識分子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現實，鮮

明地體現了十八世紀上半葉的時代特色，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上來說，這種描寫還反映出我國封建社會晚期的某些特徵。那麼，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十八世紀上半葉的時代特色究竟是什麼呢？這裡涉及到兩個基本問題：其一，十八世紀上半葉的思想潮流。其二，十八世紀上半葉的清朝政治。

同時代的思潮與政治是互有區別，又緊緊聯繫的兩個問題。統治者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力圖將時代思潮納入自己的政治軌道。一般地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據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同時代的思潮與政治的聯繫。可是，思潮的演變有其自身的規律，它不但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所左右，而且受到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的牽制。所以，思潮的演變未必與政治的變動同步。

思潮的核心是信仰，包括政治信仰、道德規範、價值觀念等等。政治的核心是政權。對統治者來說，政治就是如何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對現政權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儒家學說融道德、政治、哲學於一爐。知識分子在時代思潮中吸取何種思想，直接影響到他的政治態度。與此同時，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也會反過來影響他對時代思潮的選擇。對於吳敬梓來說，情況正是這樣。他從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中吸取了批判現實的精神，深化了自己對社會的認識，促使他在太平盛世繁榮景象的背後看到了無可救藥的腐敗和沒落。而他對盛世的失望及至否定，也促使他去向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尋覓批判的武器。《儒林外史》中反覆地強調「文行出處」，強調孝悌，既是一種道德的選擇、思

想的選擇，又是一種政治的選擇。《儒林外史》與時代思潮的聯繫，以及《儒林外史》的政治傾向，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淵源

知識分子的思想往往和當時的思想潮流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聯繫。思想潮流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普遍的精神狀態，反映了他們共同的選擇和追求。弄清當時思想潮流的趨勢及其基本特徵，弄清吳敬梓對於這一潮流的真正態度，他的抉擇取捨，以及他以何種方式與之發生關係，對於一部以知識分子為主角的長篇小說的研究來說，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時代思潮的演變

明朝覆亡、滿族入主中原的社會大變動，震動了每一個中國人，震撼了當時整個的思想界。專制的罪惡、吏治的腐敗、理學的無用，均暴露無遺。思想家們目睹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冷酷現實，身受亡國破家的痛苦，他們在痛定思痛之餘，即把自己的精力和熱情轉向對現實、對歷史和社會制度的深思、批判和總結。這是古老的中華民族在自己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由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優秀代表所發動的一次批判總結運動。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們站在比前人更加雄厚寬廣的基礎上，對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沒有他們的這一深刻批判，沒有他們對於傳統觀念和民族惰性的這一巨大衝擊，要產生像《儒林外史》這樣深刻犀利的現實主義的諷刺巨著，簡直是無法想像的。

明清之際進步思想家的社會批判中滲透著當時最徹底的史學精神。從來的思想家都沒有顧、黃、王那樣堅實的歷史感。他們一樁樁、一項項地從歷史、從制度的演變著眼、仔細地檢查封建國家機器的每一個零件、每一處細微末節，竭力要找出它的每一個毛病和隱患。他們懷著沈重的歷史感傷之情，以極大的毅力和耐心，總結了明王朝覆亡的原因，卻並不斤斤計較個人的歷史責任。盡管他們囿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囿於他們自身畢竟有限的認識能力，在當時還不可能懂得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還不可能認識社會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辯證關係。他們的苦苦探索，全部深思熟慮的批判和總結，歸根到底，仍然沒有能夠衝破儒家思想的傳統藩籬。然而，他們對封建社會的廣泛批判，那種重制度、重歷史趨勢而不重個人歷史責任的態度，那種正視現實、探索真理的巨大勇氣和魄力，依然給後人以很大的啓迪和鼓舞。

顧、黃、王的社會批判和歷史探索中，貫穿著一個共同的信念，即是他們都意識到，在喧囂的政治舞台背後，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現象背後，存在著某種不以人的意志，好惡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他們把它叫作「勢」。所以，「勢使之然也」、「其勢然也」，就成了他們的口頭禪。①作為史學觀念的「勢」，早已孕育於諸子的學說之中。②至唐人，更是有論及。③柳宗元在《封建論》中用「勢」的概念來說明郡縣制的必然性。④但是，柳宗元並沒有將“勢”的概念推廣到普遍的歷史考察中去，更沒有使之成為思想界的共同信

念。明清之際就不同了。顧炎武就十分喜歡講「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⑤「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⑥之類的話。王夫之則把「勢」的概念闡發得更有理論色彩。

乾嘉時期的社會情況，已經大大不同於明末清初那個動盪的時代。當時的知識分子完全是在清朝政權業已鞏固的時代誕生出來的。他們沒有目睹那個階級危機、民族危機深重的時代。生當表面繁榮、骨子裡危機四伏的盛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未能繼承顧、黃、王那種批判現實的精神。很多人走上了閉門讀書、埋頭考證、不問政治的道路，離開了明清之際思想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從康熙到雍正、乾隆，隨著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的日趨強化，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也日趨嚴厲，經世致用的客觀條件已不復存在。但是，思想潮流的發展並不完全取決於統治者的願望，並不一定和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完全吻合。乾嘉漢學的精髓不就是那種實事求是、不虛美、不誇飾的治學精神嗎？閻若璩的「一物不知，以爲深恥」、戴震的「實事求是，不主一家」，不正是樸學大師們嚴肅的史學精神的高度概括嗎？這種精神最接近我國史學的傳統精神。從這種意義上來看，如果說漢代經學的精神是「我注六經」，宋明理學的精神是「六經注我」；那麼，乾嘉漢學的精神不正是「六經皆史」嗎？樸學大師們以懷疑的態度追溯過去，對魏以後流傳的經籍、先儒的經注、經說提出質疑，他們在主觀上是希望探索經籍的本來面目。他們不

逞空論、注重實證、孤證不信、兼容並包，一切務求切實可靠、反對偏激偏勝的作風，正是體現了一種史學的精神。樸學大師的考證，無不窮溯事物的淵源、無不重視制度的演變，重視歷史的趨勢。乾嘉漢學從信念到方法，從研究領域到研究角度，無不受到明清之際思想家的啓迪。而注重經史、注重考證的顧炎武則恰好成爲樸學大師最好的榜樣，成爲連結前後兩大思潮的關鍵人物。了解這一點，對於我們探討吳敬梓及其小說的思想淵源是十分必要的，對於我們理解《儒林外史》諷刺藝術的特點也是有幫助的。

(二)吳敬梓接受時代思潮影響的原因

吳敬梓生於康熙四十年（1701），卒於乾隆一十九年（1754），正是思想界從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向乾嘉漢學思潮逐漸過渡的時期。明清之際思潮的高峯在十七世紀的後期，乾嘉漢學的高峯在十八世紀的下半葉，吳敬梓恰好生活在兩個高峯中間，處在兩大思潮的過渡時期。吳敬梓關於知識分子道路、命運的觀察和思考、《儒林外史》的思想傾向，清晰地顯示出這一過渡時期的痕跡。處在兩大思潮之間的吳敬梓，既受到明清之際進步思潮的巨大影響，又受到蓬勃興起、方興未艾的乾嘉漢學思潮的某種吸引。從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潮中，吳敬梓汲取了豐富的營養。顧炎武注重經史、注重歷史趨勢和社會制度的態度，顏習齋關於「禮樂兵農」的學說，明清之際進步思潮對封建社會種種弊端的批判，給了吳敬梓一定的啓發，使長篇小說《儒林外史》關於知識分子道

路和命運的思考達到了歷史的高度。

從地理上看，吳敬梓一生活動，主要在安徽、江蘇兩省，旁及浙江等地。其中江蘇尤為重要。《儒林外史》就是在江蘇的南京寫成的。十八世紀的兩位文化巨人——吳敬梓和曹雪芹都喝過秦淮河的水。吳敬梓在南京度過了牠的後半生。曹雪芹的家族有四代人在南京、蘇州、揚州等地生活了六十年之久。吳敬梓、曹雪芹都和江蘇結下了不解之緣。

江蘇、浙江是明清時代最富庶、最繁華的地區，是滿漢地主階級剝削的淵藪。康、雍、乾時期，揚州、南京、蘇州、杭州都已經發展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工商業城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在這裡重迭交錯，各種思想在這裡競爭、交流，各種學派在這裡磨礪著自己的武器。

江浙地區堪稱為明清兩代知識分子的搖籃。在清、近代的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中，江浙人占有極為可觀的比重。在清代經學的流派中，吳派的惠棟、江永、王鳴盛、錢大昕都是蘇南人。戴震是安徽人，而吳派學術給他的啓迪不可忽視。⑦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中，如著名經學家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汪中、阮元等，均為江蘇人。清、近代的史學大師萬斯同、全祖望、趙翼、章學誠、王國維都是江浙人。清、近代的文學家中，江浙人所占比重之大，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裡學術空氣之濃厚、思想之活躍、學術信息之靈通，可想而知。

吳敬梓對南京很有感情，對揚州也十分喜歡。他在《儒林外史》二十四回、四十一回，用大段文字，深情而饒有興

趣地描繪了南京這座「不夜城」^⑧的繁榮景象和風俗人情。在吳敬梓的筆下，可以看到：南京城的建築雄偉壯觀，「人煙湊集，金粉樓台」，「畫船蕭鼓，晝夜不絕」，「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那秦淮河船上的「細吹細唱」，更是「淒清委婉，動人心魄」。難怪張文虎（「天評」）就此感嘆道：「寫秦淮河風景，百世之下猶令人神往！」^⑨小說描寫南京城的大段抒情文字同作者對五河縣的暴露性描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五河縣正是吳敬梓家鄉全椒的影子。它是那麼閉塞、保守，那麼勢利而令人厭惡。《儒林外史》的基本風格是含蓄的，而在小說的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作者卻按捺不住自己的厭惡之情，直接站出來，痛斥五河縣的勢利之風：

五河的風俗，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著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裡笑；說那個人會作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是有個彭名紳；……

「我們縣里，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吳敬梓通過小說中余大先生的這句話，充分表達了自己那種厭惡和輕蔑的感情。「生耽白下殘煙景，死戀揚州好墓田」、^⑩「生平愛秦淮，吟魂應戀茲」，^⑪這就是吳敬梓這位「秦淮寓客」^⑫給

他最親密的朋友¹³所留下的印象。

《文木山房集》裡有一篇《移家賦》，是吳敬梓從全椒移居南京後不久寫成的，可以看作吳敬梓前半生思想的總結，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作者當時（三十三——三十四歲）的思想狀況。從《移家賦》來看，吳敬梓當時還遠未達到創作《儒林外史》所必須具備的思想境界和認識水平。《移家賦》中沒有一個字批判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沒有一個字否定功名富貴。恰恰相反；吳敬梓還在賦中為吳家科舉發跡的奠基人高祖吳沛大唱讚歌，¹⁴還在想像曾祖吳國對探花及第、深得恩寵，富貴榮華，如花似錦的種種情景：

三殿臚傳，九重溫語，宮燭宵分，花磚月午。張珊網於海隅，懸藻鑒於畿輔，詔分玉局之書，渴飲金莖之露，羨白首之詞臣，久赤墀之記注。五十年中，家門鼎盛，陸氏則機、雲同居，蘇家則軾、轍並進，子弟則人有鳳毛，門巷則家誇馬糞。綠野堂開，青雲路近，賓客則輪轂朱丹，奴僕則繡韞妝靚，危茜有千畝之榮，木奴有千頭之慶。

《移家賦》中，吳敬梓對自己先人以八股起家的歷史充滿了自豪。高祖吳沛雖然屢挫於場屋卻終於將五個兒子中的四個培養成了進士。而曾祖的飛黃騰達、青雲直上，也是由於刻苦鑽研八股的結果，即《移家賦》中所謂「常發憤而揣摩¹⁵，遂遵道而得路」。在小說中，吳敬梓借一個反派人物高翰林之

口說：

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那馬先生講了半生，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他要曉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

場屋中的勝利者在得意洋洋地大談勝利的秘訣，大談「舉業的金針」「揣摩」二字，在嘲笑場屋中的失敗者馬二先生。同樣的「揣摩」二字，作為「舉業的金針」，在《移家賦》中得到熱烈讚揚，而在《儒林外史》中卻成了貶抑、諷刺的對象。由此可見吳敬梓前後的思想變化有多大。

從《移家賦》中可以看出，父親去世以後，族人哄搶遺產的一場家難、家道的中落、世態的炎涼，正在激發吳敬梓的叛逆反抗意識；可是，僅僅這些因素還是不夠的。吳敬梓正是從保守閉塞的全椒，來到了繁榮開放、人文薈萃、處處得風氣之先的南京城，結識了程廷祚、程晉芳等一大批學者文人，才呼吸到了時代思潮的新鮮空氣，從而開拓了自己的心胸和眼界，深化了自己對社會的認識，深化了自己的批判意識，並進一步從個人的坎坷和不幸中解脫出來，看到知識分子的整體命運，看到了全社會的腐敗和沒落。沒有這一思想認識上的進步，就不可能寫出《儒林外史》這樣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

從友人的影響來看。吳敬梓慷慨倜儻、性喜交游，結識